

白燕考古 追求超越

卜工

白燕是山西省太谷县下辖的自然村。因1980年的考古发掘而声名鹊起。近期，故宫出版社推出《太谷白燕考古》专刊，全面介绍当年发掘工作准备，发掘成果及学术价值等。笔者1981年全年参加白燕的田野考古生产实习，也是唯一全程参与晋中考古（包括晋中调查和游邀发掘）一线工作的亲历者，自然倍感亲切，与有荣焉。四十五年前，白燕发掘工地上那热火朝天的情景、先生们的音容笑貌，师生间的友情互动，恍若昨日，历历在目。

龙头项目 超越非凡

白燕考古是晋中考古的龙头。晋中考古是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河北张家口地区山西晋中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两大支柱之一。1980年春，为安排进修班田野考古实习，国家文物局、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组建晋中考古队。

实习地点选在哪里，挖什么类型、什么时代的遗址都是问题。张忠培先生让许伟负责选点，向苏先生请教。苏秉琦明确指示发掘地点要在晋中寻找，工作目的就是探索“中原”与“北方”的文化关系。因此，许伟把考察的重点锁定在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月余后，十几处遗址的调查资料送到北京，先生看后，敲定地点就选白燕遗址。同时，要求以首次发掘为契机，从长计议，建设科研与教学双赢的基地。白燕由此进入紧张有序的考古发掘周期，历经1980、1981两个年度。经验证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白燕发掘拉开了晋中考古的序幕。1982、1983年根据白燕提出的线索与课题，晋中考古队分别在娄烦、汾阳、孝义、离石、柳林五县进行考古调查与试掘。收获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以往的认识。在白燕遗址分期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从仰韶到东周三十多段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编年序列。根据陶鬲的线索，1987、1989年晋中考古队开始了忻州游邀遗址的重点发掘，取得关键性突破。从白燕发掘到晋中调查，再到忻州游邀考古工作结束，加上补充性调查，田野工作累计十年，整理研究延续至今。

晋中考古是目的明确、主动性强的区系类型理论的具体实践。苏秉琦先生亲自为白燕选址把脉，时刻关注发掘进展，成为晋中考古开局的亮点。白燕遗址凝结着他战略规划的心血，忻州游邀遗址留下了他实地考察、悉心指导的足迹，加之，黄景略、张忠培、王克林三位先生从始至终的呵护关心，许伟老师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以白燕为龙头的晋中考古，终于在1986年进入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行列，太谷白燕因此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白燕开局 超越预期

白燕发掘令人振奋。两个年度总计发掘面积2100平方米，收获大量珍贵资料，识别出白燕一期（仰韶晚期）、白燕二、三期（龙山时期）、白燕四、五期（夏商时期）白燕六期（两周之际）等文化遗存，初步确立白燕遗址文化编年的框架，揭示出晋中地区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书写出中国考古区系类型的新篇章。因此，对晋中地区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资料表明，南起灵石口，北至雁门关，以太原盆地、忻定盆地为中心，包括晋西高原和晋东山地的部分地区，属于晋中文化区。其仰韶早期，大致属于晋南枣园文化范畴，与后岗一期文化有密切接触。仰韶中期与陕晋豫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别无二致。仰韶晚期，以白燕一期文化为代表，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半坡四期和泉峪二期相当。龙山早期只在太谷白燕遗址发现“庙二”釜形斝，其后便是双鬲隔一家独大的崭新局面。进入夏代，高领隔秉承双鬲隔的传统，一方面经营坚守晋中，另一方面继续南下漳河与东出太行，为先商代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这些成果为学术界高度重视。邹衡先生等曾亲临指导。因此，白燕发掘不仅起点高，而且后劲足。白燕遗址有四种器物，给人印象深刻。一是F2的釜形斝，二是夏商时期的多套鬲，三是商代嘜口罐，四是晚商大墓的金耳环。这四种器物特征鲜明，指出出晋中白燕与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亲缘关系，与太行山东麓商文化的血缘关系，与殷墟妇好墓的亲属关系，与石楼青铜器的族系关系，成为日后深度研究的增长点。

陶鬲谱系 超越文化

白燕最有特点的器物是鬲。最先提出鬲谱课题的也是白燕。陶鬲纵贯白燕遗址第三、四、五期。尤以第四期夏代高领隔，第五期商代高体隔夺人眼球，此前无人知晓其存在与否，更不知其意义何等重要。白燕考古不仅将前人关注的陶鬲系统科学地挖出来，还提炼出逻辑清晰、穿越时代的传承谱系。陶鬲是中国古文化中含金量较高的标型器，往往是文化与族群的标志。早在1947年，裴文申《中国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1948年苏秉琦《瓦鬲的研究》均分别发表在当年的《中国考古学报》。邹衡对二里岗和殷墟商鬲的研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咬定陶鬲不放松”正是晋中考古的核心理念。

但是，白燕高领隔却是以往不曾认识的新类型。所有的分型分式必须从源头搞起。其怎样发展和如何演变必须通过反复实践，不断检验才能逐步认识的。那时，晋中地区还鲜有可资比较的材料。特别是白燕第三期的陶鬲数量少，且不能复原，但与高领隔的关联却显而易见，探索其来龙去脉自然就成了下一阶段的首要任务。

晋中调查在多个地点发现富含大量陶鬲的遗存。白燕的线索进一步增多。这类鬲以肩部的双鬲为特征，数量多，形体大，在晋中及其以北地区有广泛分布。以往被称为陕西龙山文化的新类型，老陕山文化、新华文化、朱开沟文化、杏花村文化，实际上都是其不同的称呼。调查材料还显示，汾阳、柳林、孝义等地的双鬲隔在形态方面有明显区别，还有类型划分与年代分期的可能。它们与白燕高领隔尚存有明显差距。因此，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材料仍需继续

寻找。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忻州游邀遗址的发掘终于形成了对晋中双鬲隔分期、分类和年代的全面认识。特别是许伟在游邀遗址最晚的几个单位中，甄别出双鬲隔是怎样转化为白燕高领隔的具体环节，从而把晋中地区的双鬲隔、高领隔和深腹隔紧密地连成一体，晋中地区龙山到商代的文化基因就这样被识别出来。谱系传承是超越时空、超越文化的内生动力，是晋中地区生生不息，稳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文化共同体持续进步的基本保障。

龙山时代的双鬲隔、夏代的高领隔，商代的高体隔均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原生器，均有自己的发展序列，演变规律比较清晰，谱系关系可以确定。其中，双鬲隔经过矮领双鬲隔向高领双鬲发展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缺环，之后演化为高领隔，双鬲退去，高领不再有纹饰，带沟槽的实足跟出现。目前在晋陕高原只有忻州游邀遗址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上述的变化与规律。而高领隔向高体隔的发展也只见于太谷白燕遗址。尽管时代不同，但三者实属同宗同脉的传承大系却不容置疑。许伟称之为“晋中主根脉陶鬲”，既是对晋中陶鬲谱系的别样表述，也突出了其独树一帜的显赫地位。

这种情况与山东地区的史前陶鬲颇为相似。与晋中陶鬲一样，那里的史前陶鬲，泛指东夷族群的文化共同体，在学术界广为流传。有鉴于此，晋中陶鬲的概括乃是中国考古的惯例，其优势不仅是言简意赅，名副其实，而且，有助于在历史长过程中和更加辽阔的空间范围内考察上古遗存的发生与发展，推进族属研究，钩沉城商古史，解读晋陕高原的独特风光。

白燕连接晋陕高原的南北两端，晋中陶鬲对应山东地区的史前陶鬲。历史上的“东夷西戎”原本就活灵活现地流淌在现实生活中。资料表明，戎族群的综合实力超乎想象，其文化上类型多样，文獻上更是名目繁多，相对复杂。石峁、芦山峪和陶寺古城都与陶鬲有不解之缘，且集中分布在晋陕高原地区，足以说明戎族群超级强大，实力不凡。

晋中陶鬲是中国陶鬲谱系的核心与主脉。此前，人们的认识仅仅局限在某个时空范围内，或某种考古学文化中，而此后，从文化格局，谱系传承，族群属性，历史作为等特殊意义才进入到新的境界。这是《太谷白燕考古》的最精彩的精华内容，与惊艳时光的特殊魅力。

透物见人 超越传统

白燕考古的传奇还在于：透物见人，超越传统，为妇好寻故里，为先商找源头。而且是两重证据，铁证如山。显而易见，科学发掘和深度研究是白燕考古的两面旗帜。

众所周知，1976年发掘的殷墟五号墓被研究确认为妇好墓葬。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三大配偶之一，是中国古史记载的巾帼第一英雄，但她究竟来自何方却鲜为人知。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等稀世珍品。其中的青铜嘜口罐最引人注目，与其他青铜礼器风格迥异，一望可知并非商人用器，但此器确有“妇好”铭文。无独有偶，白燕挖出的陶质嘜口罐和忻州宴村发现的陶质嘜口罐，刚好与此完全相同，别无二致，正所谓“娘家器物证娘家”，青铜嘜口罐原是模仿妇好家的陶器制作，属腰器一类，代表着妇好的出身。如此，“妇好”及其母族的来源和家乡的问题获得关键性证据，研究因此出现重大转机。白燕发掘提供出新证据，犹如为此论碑上封条，使其成为定论。白燕商代遗存的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陶鬲谱系、卜辞研究和历史文献等多学科信息拧成一股绳，打造出严密完整的证据链，让有娥的家乡定格在晋中地区。接下来，有娥国都，有娥之墟，有娥婚姻、历史贡献诸问题便不断浮出水面。

简言之，晋中考古认识了本地的文化面貌，捋顺了双鬲隔到高领隔再到高体隔和商式隔的发展谱系，印证了殷墟卜辞关于城商联姻的研究成果，揭示出一个族群用几百年的时间，托起一代王朝的崛起，写就将陶鬲进行到底的鲜活历史，不仅撬开商人起源的古史大门，更为中华文明的主根脉贡献出有血有肉、浓墨重彩、能见可考的历史新证。

科教双赢 超越一流

白燕考古的初心就是科研教学的双赢。四十五年后的回望，答案就写在《太谷白燕考古》的字里行间。区系类型的工作模式、透物见人的研究模式、生动活泼的教学模式是白燕经验的三大法宝。参加过白燕考古发掘的人都知道，白燕的田野考古教学生动活泼，别开生面，很有特色，作为教学科研基地的经验，曾在吉林大学校内进行交流，荣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并以《着眼学科发展现实需要，加强田野考古教学科研工作》为题，在校刊《高教研究与实践》1989年第3期发表。昔日的辉煌，见证了白燕考古教学与科研基地的历史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考古发掘经费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白燕仅仅依靠租用的民房，建立起白燕教学科研基地，成为晋中考古的大本营，为五县调查，游邀发掘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成为吉林大学田野考古教学的一面旗帜。白燕经验证明，田野考古教学必须始终坚持考古学的底层逻辑，实事求是，从材料出发，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增强对材料内涵的理解，逐步扩大历史场景复原的思路，精准概括规律性现象，丰富知识体系的新内容。

其实，田野考古教学的成功与否，只有两个硬性指标来衡量：一是出人才，二是出成果。参加白燕发掘的大约有130人，他们在后来的考古生涯中，有的成为基层文博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成为高校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对白燕的田野考古教学有口皆碑，共同的感受就是十六个字：全新体验，超乎想象，提高很多，超越自我。

毫无疑问，《太谷白燕考古》是晋中考古的最后一张拼图，既是完美收官，也是深层总结。当年考古前辈的殷切期望，项目设计的预期目标均已实现，更是直接把超越写进了历史，因此，必将成为中国考古的经典名篇载入史册。

陶器通常是以破损形态进入考古情境中的，长期以来研究重点多放在复原完整陶器进行类型排比、年代判断和文化分期，较少追问陶器破碎后又经历了什么。如果将目光从器物形制转向史前聚落的日常生活，当陶器受损后，并未立即退出日常生活，它们可能会被修补后重新投入使用，或被改造为次要用途，这一现象在仰韶文化尤为突出。

对仰韶文化核心区即豫西、晋西南及关中地区64处已发掘并发表资料的遗址进行统计，明确存在陶器再利用现象的遗址有57处，占比达89.1%，陶片改制的圆陶片达上万件，陶刀达上千件。这一比例及数量说明，陶器再利用并非个别遗址、个别场景下偶尔出现的，而是仰韶聚落中普遍的日常生活的实践。

根据陶器破碎程度及功能是否转换将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分为三个类型，其破碎程度依次递增，器物功能从容器主导向非容器功能转变，最终回归物质原料层面，再利用的彻底性逐级增强。

破损陶器的二次利用

边缘出现缺口或裂纹通常不会影响使用性能，而延伸至器身的裂纹则可能会影响容器的储液能力，只要残损未严重到影响基本容器功能，器物仍有继续使用的价值。此类再利用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作改造，直接转作他用；另一种是经过修补改制后继续使用（见图）。

1. 无改造二次利用：指破损器物未经任何人工修整，直接转作其他功能。民族考古学研究揭示了陶器无改造二次利用的多种形式，如破损的盆、钵常被用来盛放种子、调料或作为饲养幼畜的食槽。此类再利用未留下明显的人工痕迹，在考古材料中较难识别，目前仅在少数遗址中发现例证。如西阴村遗址残盆（H34：5），出土时为半个残盆，内有较厚一层红色颜料。应为破碎后未做改造直接被当作调和颜料的容器。

2. 经过修补改制的二次利用：不改变破损器物容器功能的前提下进行局部修整，包括缀孔修补与修磨改制两种方式。

缀孔修补 这是新石器时代最常见的陶器修补技术，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出现。在器物破裂处的两侧对称钻孔，再用植物纤维绳或皮条将破裂部分缀合在一起，不对器物原有形制做大幅改动，维持其原生形态与主要功能。这一技术相对比较稳定，缀孔修补的器物集中在钵、盆两类，少量瓶、缸上也有修补现象。在新安荒坡遗址、涓池班村、枣园遗址、西安鱼化寨、蓝田新街遗址、华县泉护村等遗址多有发现。新安荒坡遗址钵（H21：2）上部有两处裂缝，均钻两个圆孔缀合修复，孔径0.3厘米。枣园遗址平底钵F1：30，在靠近器物的口沿位置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小圆孔，两孔十分规整，位于两块可以拼接起来的陶片相对应的位置，相距2厘米，应是在使用期间器物已损坏时，当时对其进行修复时钻开了一对圆孔用来穿系绳索。大河村遗址发现一件白陶陶环有缀孔T11⑥D：88，两端各钻圆孔一个，这是目前发现的极少数非容器类器物的缀孔修补案例。

修磨改制 仅对破损部位做简易修整，如修整打磨断口，使其能够继续作为容器使用。被改制的有鼎、瓮、豆、罐、盘等多种器类。东关遗址豆盘（H31：5），豆座残缺，器底可见修磨痕迹，残后可能作钵使用。盆（H56：114），由圈足器改制，沿残，修磨后成窄沿，圈足残缺后将底边磨平，继续使用。河南镇遗址盘（T103③d：1），该器本为豆，圈足残破后，又经打磨，继续使用，底部仍留有圈足未全部磨掉的痕迹。

能被二次利用的陶器偏向钵、盆这类盛器，材质以泥质为主。一方面夹砂陶易破裂，不适合钻孔修磨，另一方面钵、盆作为日常生活用具中数量多且移动频繁的器物，更容易损坏，因此更有被再次利用的现实需求。



破损陶器二次利用

陶片改制

陶器作为“容器”的生命结束后，对陶片进行二次加工，制作成可再次利用的非容器类器物，原器物只作为“原料坯件”，其功能发生根本转换。这是仰韶文化中最常见的陶器再利用形式之一。在57处明确存在陶器再利用现象的遗址中，有55处发现陶片改制器物，占比高达96.5%。这一比例表明，陶片改制不是个别聚落的特殊习惯，而是横跨仰韶文化各阶段、贯穿多个区域的一种基础利用方式。

从制作工艺看，仰韶文化陶片改制主要依赖打制、磨制与钻孔三类手段。打制便于快速获得大致形状，磨制则可进一步修整边缘提升器形规整度，钻孔则与悬挂、系缚、旋转等具体功能相联系。根据功能是否明确，可将改制器物分为功能明确类与功能不明类两组。

功能明确类 主要包括陶刀、陶纺轮、陶铎、陶铲、陶网坠、陶埴、陶钻等生产工具类及陶环、陶坠等装饰品。

功能不明类 以圆陶片最具代表性，此外尚有舌状陶片、磨边陶片、多角形陶片、双刻槽条形器等。这类器物虽然可确认经过二次加工，但其具体用途并不总是能够从形制直接推断。有些可能兼具生产、游戏、计数、象征等复合属性，因此较难以单一功能概括。

陶片再循环

当陶片过于破碎，无法改制为实用器物时，陶片会作为建筑骨料或制陶原料重新参与物质生产过程，不再以器物残件的形态存在，而是进入物质原料层面的循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现象的证据性质与前两类并不完全相同。对于个别遗址中碎陶片是否为先民有意识掺入，抑或在取土、填筑过程中混杂进入，仍需结合具体遗迹形态、堆积结构与材料组合作进一步分析。

在仰韶文化遗址中，碎陶片在建筑中的应用较为突出，主要包括柱洞柱础、柱洞壁修整、房基铺垫、墙基填土与灶址建造等方面。

柱洞柱础：在姜寨、零口村遗址，碎陶片与石子等混合被填入柱洞起柱础作用。姜寨遗址F1部分柱洞内填石子、碎陶片、料姜石块、红烧土块等。零口村遗址房址柱洞，先在地面挖一竖穴，填入夹有红烧土块、碎陶片的黄土，槌打坚实。将木柱竖立穴中，填入黄泥或者黄土，槌打坚实，形成硬土圈，柱竖立穴中填入褐色土，槌打坚实。这样的硬土圈分两层，内层为黄胶泥圈，外层为灰色硬土圈。

柱洞壁修整：芮城东庄遗址与蓝田新街遗址均发现柱洞壁加固技术，芮城东庄遗址F201、F203部分柱洞以屙有陶片碎粒的黑细泥涂抹洞壁与洞底，厚度可达5厘米，质地十分坚硬。蓝田泄湖遗址F5柱洞则进一步采用细碎的红陶片拌细泥涂抹再经火烧烤，平整而坚硬。这种做法的技术逻辑与夹砂陶制作原理相近，细泥屙入陶粒减少开裂。

房基铺垫与墙基填土：垣曲苗圃遗址F101，房基填土有大量陶片。渭南白水河下遗址F2，内墙填红褐色土，为烧土块、碎陶片、小石子、草拌泥混合构成，这种混合增加了墙体的强度。

灶址建造：蓝田泄湖遗址F3，室内正中有一“瓢”形灶坑，灶坑壁采用细碎的红陶片搅拌细泥涂抹，然后经火烧烤而成，表面光滑坚硬。临潼姜寨遗址K6，灶面铺一层夹砂陶片，陶片下红烧土厚5～10厘米。

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的特征与历史演变

从器物生命史的角度看，破损陶器的处理方式大体呈现出由修补续用、陶片改制到材料再循环的层级递进：当器物仍可维持基本容器功能时，往往通过修补继续使用；当其难以继续作为容器使用时，部分陶片会被改制为非容器类器物；而当陶片过于细碎、不再适于改制时，则可能进一步作为原料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并不是每件陶器都会依次经历上述多个环节，而是反映出破损器物在处理方式上的层级差异，并且不同类型之间并不均衡，其中，陶片改制最为普遍，共见于55处遗址，陶器二次利用共见于18处遗址，陶片再循环仅有7处。

从区域分布看，陶器再利用现象不仅集中见于豫西、晋西南和关中核心分布区，在甘青地区、内蒙古中南部以及豫中、豫西南、豫北冀南等外围地区也有发现。以陶片改制为例，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出现频率，核心区都明显高于外围地区。这说明，陶片改制首先是在仰韶文化核心区域内较为普遍的生活实践，而在外围地区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接受与延续。

从时间序列看，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现象并非短时存在，而是贯穿于仰韶文化初、早、中、晚整个阶段，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其中，圆陶片与陶刀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两类改制器物，其数量消长能够较清楚地反映陶片改制现象的历时变化。仰韶文化初期至早期，圆陶片更为流行，核心区圆陶片数量高达4000余件，这一现象延续自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老官台文化传统，说明其背后的使用习惯与观念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到了仰韶文化中期，圆陶片数量显著减少，陶刀的数量与分布范围显著增加，陶刀的数量超过圆陶片，成为改制器物中的主流类型。这一变化表明，仰韶先民对陶器的再利用是会随着生产方式和日常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具体形式的，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具有持续性和适应性。

结语

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仰韶文化分布区，贯穿发展全程并有历时性演变的一种日常生活实践。过去对仰韶文化的讨论，集中于彩陶、聚落布局、房址、墓葬和农业经济，破损陶器常被视作不言自明的附属材料。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残器和陶片，更能揭示史前社会最具体、最真实的生活逻辑：资源有限，器具须尽可能反复利用。对仰韶先民而言，陶器不是完整有价值，破了就作废的一次性物品，而是能够随着形态变化不断转换用途的物质资源。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现象所揭示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修补改制，也反映了史前聚落社会中日常生活、资源利用方式与物质观念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些带有裂缝、钻孔、磨痕和改制痕迹的残器，或许更能让我们接近仰韶先民真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

【本文为2025 河南省财政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论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现象”（2025HKYJKY03）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广告

Micro 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数智护文脉
元智赋新生

文化遗产全链数智
解决方案提供商

科技保护

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馆藏设施、文物运输监测、文物展柜、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

智慧管理

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

智慧服务

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咨询服务、熏蒸消杀服务、展柜气密性评测服务...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13572270596（张总） 座机：029-89246388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www.microwise-system.com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研发E座4F